

历史研究

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与《湘军志》毁版事件^①

彭平一

(中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在湖南绅士中激起了一种“湘军情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湘军志》的编修及其被毁版,与这种“湘军情结”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湘军志》被毁版,也反映了湖南绅士的“正统湘军观”。

关键词:《湘军志》;湘军情结;王闿运;正统湘军观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61-04

《湘军志》毁版后百余年间,对其评价毁誉不一。已有学者从史学角度对《湘军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无意从史学史角度对《湘军志》进行评价,只是把《湘军志》毁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分析其在19世纪后期湖南绅士“湘军情结”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一 湘军事功激起的“湘军情结”

湘军于1864年攻占天京后大批裁撤,大量湘军官兵带着他们的军功回到湖南。他们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功业记忆和政治文化优越感带回了湖南;而清王朝和那些回籍的湘军将领在湖南各地以各种方式褒扬和宣传湘军战绩,从而在湖南激起了一种弥久日盛的“湘军情结”。

那些因军功而授予的上到总督、巡抚,下到游击、都司的实职和虚衔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褒奖。据统计,在182名可查的湘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中,被授予总督、巡抚的有27人,授予提督、布政使等其他实职的有131人^{[1]64}。在一般员弁中,因军功被授予游击以上虚衔的,仅在湖南就有6319人,湘乡一县竟达2490人^{[2]3109-3163}。这些人的军功,成为了“湘军精神”的外在表现,自然,他们也就成为了湖南人为之骄傲的捍卫名教和皇权的忠义诚勇典范。

由湘军将领或地方官员奏请朝廷对战死或以后死亡的湘军将领赐恤,并建立专祠或入祠附祀,“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也是对湘军精神褒扬和宣传的重要方式。“自军兴以来,楚南建专祠者不下十余人,附祀者且数万人。”^[3]这只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记载。这种赐恤和建祠祭祀的

援例一起延续到清亡,其间对于原来立有战功的湘军将领死亡后都“援例赐恤”,有些还建专祠祭祀或附祀。从1871年到1911年还有多少湘军第一代、第二代将领获得如此殊荣,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陈宝箴担任湘抚期间湖南赐恤和建祠祭祀对象的数目来看,这一数字当不在少数^①。对湘军将领赐恤和建祠祭祀,“向世人昭示着湘军的赫赫战功和湘绅奋起卫道,前赴后继血洒疆场的悲烈壮举,使活着的人们由衷产生一种崇拜敬畏之情。”^{[4]110}毫无疑问,这种形式对于传播和延续湘军的价值理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平定了太平天国后,湘军将领还以刻书、修志、兴学等文化活动来宣传自己及湘军的事功,弘扬儒学圣道。在攻下南京后,曾国荃于1864年在此设立金陵书局,刊刻《船山遗书》,曾国藩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参与了该书的考异校阅。该书于1865年刊成后,曾国藩大量地分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王船山的“忠”、“仁”、“礼”思想达到整肃人心风俗,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得到了湘军系统回籍将领和官员的遥相呼应。彭玉麟在其家乡衡阳创立船山书院,并亲聘王闿运为山长,曾国荃将所刻《船山遗书》赠之。郭嵩焘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时,建船山祠“于南轩祠之旁”。后来又创思贤讲舍,以奉祀王船山为讲舍必行礼仪。郭嵩焘在表明创建船山祠的目的时说:“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乱治之故,皆能默契于心。”^{[5]513}这与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

① 收稿日期:2013-02-2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WK10)

作者简介:彭平一(1953-),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① 根据陈宝箴担任湘抚期间的奏议统计,经他奏请朝廷赐恤、建立专祠或附祀、入祀的湘军将领共21人,其中赐恤9人,建专祠5人,附祀或入祀7人。

目的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同光间湘军将帅多回乡资助和倡修州县志，一时湖南修志成风。”^{[6]17}与前述刻书活动一样，重修地方志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道，整肃人心风俗，重建伦理秩序，使“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贤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7]卷首}。同时，也有宣扬湘军战功，弘扬其卫道护圣功业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回籍的湘军将领纷纷以各种形式，或捐资捐物、或策划赞商、或挂名主纂，有的甚至亲自出马参与编修。同治一朝湖南全省共有长沙、衡阳、湘阴、宁乡、桂东、桂阳、新宁等50多个府、州、县的地方志得以重修，彭玉麟、李元度、席宝田、郭嵩焘等湘军的重要人物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74年，更有曾国荃和郭嵩焘主纂的《湖南通志》成书。

二 《湘军志》的编修及其毁版

正是在这种褒扬和宣传湘军事功的社会文化热潮中，《湘军志》的编修成为了这股热潮的高峰。

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后就有意编修湘军史志，但一直议而未行。郭嵩焘给友人信中说：“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劄刚一以属之王壬秋。”^{[8]37}南屏即当时湖南著名才子吴敏树（岳州人）。他与左宗棠为同榜举人，与曾国藩“交尤笃”。但他曾称：“不望见用于时，犹愿发挥文字。”曾国藩两次请其入幕，“亦婉言谢绝”。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吴敏树曾随曾国藩出巡，遍访江南旧战场。他“欲撰写湘军战绩告曾国藩，曾因不满意所言写法，未置可否。”^{[9]340-341}后来，吴敏树又致信郭嵩焘，主张“欲得一备知首尾之人，先具一纪事本末之稿”^{[10]254}。曾国藩生前曾属意王闳运来编修湘军史志。据传王闳运受曾国藩之托，撰湘军史志提纲给曾国藩看，曾要王闳运“为尊者讳”，并许以“谢万金”，遭到拒绝。此事是否为实，固难考证，但曾国藩属意王闳运撰写湘军史志却是事实。曾国藩死后，编撰湘军史志之议重新提出。其子曾纪泽于光绪元年（1875年）请王闳运编修《湘军志》。曾纪泽认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而之所以委托王闳运，是因为王闳运“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11]75-76}

平心而论，王闳运也确实是编修《湘军志》的合适人选。首先，王闳运是当时名士，湘军部将等意欲表彰湘军功烈，当然想借重王氏的名声；其次，王闳运“志在撰述”，尤长于史志，此前已主持修撰《桂阳州志》《衡阳县志》《东安县志》，参与校定《清泉县志》^[12]；其三，王闳运与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关系密切，“情同袍泽”，从曾纪泽等来看，由王闳运主修《湘军志》，应该对宣扬湘军事功有利。

王闳运为撰写《湘军志》也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他深知修湘军史志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6]650}况且，他毕竟没有参与湘军的军事活动。他曾入曾国藩之幕，“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8]38}因此，在了解

和掌握史实方面是有其不足的。但他还是尽可能多地披阅了他能接触的材料。从光绪三年五月，他开始撰写《湘军志》，到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在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期间，他又多次“改定《湘军志》”，补充了《援蜀篇》《川陕篇》《营制篇》等，直到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始成”。十月，“《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11]82-111}。

王闳运对《湘军志》自视甚高。他日记中记载撰述《湘军志》过程，时有自得之词。如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日记：“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记：“作《曾军篇》成，共十二叶，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记：“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及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6]643-648}他把他的《湘军志》比作司马迁的《史记》，这大概不仅仅是指文笔和对史料的把握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他能够“秉笔直书”，“成一家之言”而自负。而恰恰就是这一点，使他的《湘军志》遭到了湖南绅士，特别是在湘的湘军将领的激烈反对，最终竟遭毁版之祸。

王闳运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带着在成都刻好的《湘军志》书版回到长沙。他刚回到家，郭嵩焘就登门拜访。王闳运即“送《湘军志》一部为答”^{[6]1062}。此后，他又将《湘军志》分送给长沙的一些湘军旧将与绅士。然而，令王闳运“甚为得意”的《湘军志》却遭到了在长沙的湘军旧部与湖南绅士的激烈抨击。首先是曾国荃，在王闳运归湘后去拜访他时，他“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据说曾国荃还扬言要杀王闳运以解心头之恨。长沙城内的绅士们也纷纷加入到谴责王闳运的行列中。郭嵩焘是最早提议修《湘军志》的，这时也是对王闳运指责最多的绅士，被称为“反对《湘军志》的领袖人物之一”^{[8]37}。而郭嵩焘在长沙的寓所也成为了绅士们议论、谴责王闳运的舆论中心。众绅纷纷谴责王闳运在《湘军志》中对湘军诸将领的讥议诋毁，甚至责骂王闳运“惑世惑民”，“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祸之中于人心风俗，诘减于猛兽洪水者？”^{[10]253}许多平时与王闳运过往甚密的老朋友也纷纷指责他“贬斥太多，不免犯众怒而动公愤”。当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四川人李榕也谴责王闳运，“恨《湘军志》较沉浦尤甚”，以至于王闳运不得不写信给李榕，表示“他日闯王殿下，亦惟有俯伏认罪，自投油锅”^{[13]12}。

面对如此“公愤”，王闳运开始只是想让受赠《湘军志》者烧毁了事。光绪正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然而，绅士们仍不罢休。郭嵩焘与黄子寿、左锡九、余佐卿、张笠臣、朱香荪等商议，提出要王闳运“尽交出其案卷及《方略》诸书，并所刻板片及刷就之百部，全数清交，徐筹改刻之法。”朱香荪甚至提出，王闳运在湖南“无可自立之势”，要他“及时出游，俟一二年后人言稍定，始可回湘。”^{[14]252}面对压力，王闳运极不甘心。当左锡九受众绅之托来他家催交书版时，他非常生气地说：“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复，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费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既

愿毁之，又何劳索？”^{[6]1072}但他最终还是难犯众怒，不得不于三天后将书版及已印成的书送到郭嵩焘处。郭嵩焘“函询曾沅浦官保，复函属交子寿、笠臣。二君之来，盖承沅老之命，商酌领取。”^{[14]255}《湘军志》初版最终被毁了。这就是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湘军志》毁版事件。

三 王闿运的名士性格与《湘军志》毁版

如上所述，曾纪泽和郭嵩焘等之所以属意王闿运来编修《湘军志》，一来为了借重王闿运的名士声誉，以提高湘军的地位；二来认为王闿运与曾国藩以及其他湘军将领多有来往，“亲同袍泽”，让他来撰写，“功业或亦未敢多让”。

然而，恰恰是曾纪泽和郭嵩焘等绅士想要借重的名士声誉使他们宏扬湘军功业和精神的目的没有达到。王闿运（包括前述的吴敏树）作为当时“名士”与一般绅士有着不同的政治性格。他们一般名高而不仕，这使他们与一般既仕而名显的达官贵人有一种本能的隔阂。王闿运曾献谋于曾国藩，但曾国藩对其敬而远之。这就使他有一种不得志的“落落寡合”之感。他在给吴大澂的信中说：“闿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所差胜者。”^{[15]55}说明他也为自己没有得到重用的机会而叹息。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多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说：“闿运自不欲以功名见视当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间，亦非节下诸公札调能来，亦非诸公肯荐自代，有贤无贤，何与人事。”^{[15]21-23}从这些议论中足可以看出王闿运自命清高，又不甘寂寞的“名士”性格。正是这种“名士”性格使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不愿用他；也使他曾左胡等久有怨言。而在查阅种种史料的过程中，他又接触到这些湘军统帅不被常人所知的一些弱点，因此，他借机发泄自己的私怨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徐一士说他“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8]38}征诸王闿运的性格，想必此说不假。更何况王闿运将自己“作《湘军志》，庶乎铁承祚蔚宗”，又将自己写的《湘军志》自比司马迁的《史记》，以“秉笔直书”自负。王闿运自谓效法司马迁、陈寿和范曄“秉笔直书”既有其史学观的因素，同时也不能排除其用“秉笔直书”来突出自己的“名士”性格的因素。因此，他在《湘军志》中对湘军将领的批评，既有“秉笔直书”的一家之言，也有以讽刺揶揄发泄自己私怨的原因。究其深层次原因，更多的恐怕是王闿运的“名士”性格使然。

然而，恰恰是王闿运“名士”性格和“秉笔直书”触犯了那些出钱让他修史的湘军将领的大忌。徐一士说得好：“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8]38}王闿运为显示自己的“秉笔直书”和名士性格，对湘军将领进行贬抑和讽刺，怎能达到“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的目

的呢？难怪《湘军志》一出，马上激起了“湘人的公愤”。公愤首先是起于曾国荃。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曾国荃引以自豪的克复金陵之战写得非常简略，平心而论，作为这场恶战的指挥者，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其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王闿运还将攻破金陵后，曾国荃纵兵在城内大肆抢掠之事也捅了出来，难怪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10]254}。

曾国荃的怒气很快扩展为长沙绅士们的“公愤”。在曾国荃对王闿运“盛气责之”时，后来齐声谴责王闿运的大部分绅士可能还没有细读《湘军志》，即使有人读，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正如事后王先谦所言：“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为私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8]42}在曾国荃指斥王闿运后，郭嵩焘“取其书而读之”，发现了更多的问题，进而开始批评王闿运。在曾国荃和郭嵩焘先后发难后，“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而郭嵩焘等认为王闿运“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气习，不足怪也”^{[14]254}。在这里，绅士的“湘军情结”与王闿运的“名士”性格的隔阂和对立昭然若揭。

四 “正统湘军观”与《湘军志》毁版

在对王闿运的批评谴责中，我们更应注意其中所包含的“正统湘军观”。这种“正统湘军观”正是湖南绅士“湘军情结”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会“正统湘军观”。

第一，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湘绅认为，湘军是湖南的军队，是湖南人的骄傲，写湘军事迹当然应该突出湘人。所以，对《湘军志》有意或无意埋没湘军湘籍将领的写法，众绅感到非常愤怒。张自牧（字笠臣）直指《湘军志》为“诬善之书”，认为此书“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10]254-255}。郭嵩焘在其日记中记载：“阅壬秋《湘军志》一卷，极意表塔忠武公，而于王初田亦颇叙其战功，湖南人士，多隐其名，似不免意为高下。张笠臣所述，实亦信而有徵。”^{[14]253-254}他还指责《湘军志》“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10]254-255}说王闿运因掌握史料的多寡而导致所记史实详略不当，这种情况是免不了的，甚至可以说王闿运因个人感情的好恶，有意识对某些他不喜欢的人（如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少记或不记，这种情况或许也是有的。但说王闿运有意不记湖南人，“湘人一皆从略”，“直以是蔽罪湖南”却很难说是事实。而这恰恰成为了众绅攻击《湘军志》的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郭嵩焘等要如此认定，并大兴问罪之师呢？究其原因，只能说是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中掺杂了更多的湖南地域情感，这正是当时湖南掀起的宣传歌颂湘军热潮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湘绅把曾国藩视为湘军的领袖和灵魂，因此，《湘军志》的记述，必须以曾国藩为中心，也容不得对曾国藩有些许“微词”。毫无疑问，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曾国藩确实是湘军的领袖和灵魂。然而,曾国荃和郭嵩焘等强调这一点,恐怕有更深的用意。还是在《湘军志》的写作过程中,王闿运将写好的《曾军篇》给郭嵩焘看,郭嵩焘就指出该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后来,他又在《湘军志·曾军篇》的批注中说:“案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10]223}表面上来看,郭嵩焘指出了《曾军篇》名称之不妥,似乎是《湘军志》体例篇名的问题,但实际这是“曾国藩是湘军创始者和灵魂”这一“正统湘军观”的明确宣示。徐一士看出了这一点:“曾国藩以湘军领导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拜;《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仅亚国藩;闿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8]38-39}以曾国荃和郭嵩焘为首的湖南绅士批评《湘军志》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突出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创始者和灵魂的地位。这恰恰违背了湖南绅士的“正统湘军观”。当然,对曾国藩地位的确认,无疑也有为曾国荃争地位的含义。

王闿运在面临湖南绅士指责时给丁宝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湘中兜鍪余气,笨伯如初。刘(坤一)、曾(国荃)告归,城中顿有二督。岷首雍容,即当见录;沉弟鞅鞅,未知所由。昨乃怪怨闿运,以所作《湘军志》为诋诃功烈。金刚之徒附和一词,怒于市而色于室,已为可叹。而鄙州人士怙于名位,竟成积习,身与交游,莫能救之。以此知史公论淮阴未能学道,诚实见其所以然。而闿运德望俱无,坐观抗攘,亦实无挽回之力,湘人愚直之风遂已衰矣。初在城日少,尚未料其至此,此又一隅之隐忧耳。”^{[15]131-132}此处所说“兜鍪余气”当指由湘军事功所激起的湖南绅士之气。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王闿运已经意识到他所得罪的不仅仅是个别湘军将领和绅士,而是触犯了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这也是他不得不交出《湘军志》书版的重要原因。

五 结 语

总之,《湘军志》毁版事件不仅仅是对《湘军志》这一史书的评价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湖南绅士的一种文化心理状态。这种称之为“湘军情结”的文化心理对19世纪后期湖南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罗尔纲. 湘军新志[M]. 上海:上海书店,1989.
- [2] (清)卞宝第,李瀚章,修. 曾国荃,郭嵩焘,纂. 湖南通志(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3] (清)刘采邦主修. 张延珂,张华理,萧瑞庚,等纂. 长沙县志卷十四秩祀二[O]. 湖南图书馆藏,同治十年刻本.
- [4] 许顺富. 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 [5] (清)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78.
- [6] 王闿运. 湘绮楼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97.
- [7] (清)卞宝第,李瀚章,修. 曾国荃,郭嵩焘,纂. 湖南通志(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8] 徐一士. 近代稗海·一士类稿[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9]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人物志上册[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 [10] 王闿运,郭振塘,朱德裳. 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M]. 长沙:岳麓书社,1983.
- [11] 王代功. 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湘绮府君年谱[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 [12] 陶先准. 王闿运生平大事年表[J]. 中国文学研究, 1985(1):44-52.
- [13] 萧艾. 王湘绮评传[M]. 长沙:岳麓书社,1997.
- [14] (清)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第4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15] 王闿运. 湘绮楼笈启[O]. 宝山尚友书房,宣统元年.

Hunan Gentry's Complex Emotion of Xiang Army and the Destroyed Edition of *Past Records of Xiang Army*

PENG Ping-yi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Xiang Army pacifie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t aroused the complex emotion of Xiang Army among Hunan Gentry. As a so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i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iling and destroyed edition of *Past records of Xiang Army* (*Xiang Jun Zhi*) and the complex emotion of Xiang Army. At the same time, the destroyed edition of *Past records of Xiang Army* (*Xiang Jun Zhi*) has also reflected the Hunan Gentry's orthodox view of Xiang Army.

Key words: *Past records of Xiang Army* (*Xiang Jun Zhi*); the complex emotion of Xiang Army; Wang kai -yun; the orthodox view of Xiang Army

(责任编辑 朱正余)